臺大歷史學報第 47 期
2011 年 6 月，頁 283-294

BIBLID1012-8514(2011)47p.283-294
2010.5.14 收稿，2010.12.6 通過刊登

§書評§

評介達索彬，《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歷史地理學思潮，1900-1949》

Sabine Dabringhaus, *Territorialer Nationalismus in China: Historisch-geographisches Denken 1900-1949.*
Köln, Weimar, Wien: Böhlau Verlag, 2006. xi+371 pp.

艾　立　德*

一

學界近十幾年來，從文化建構、國際關係、移民群等不同角度對中國民族主義進行分析，使得原本「經常被喚起，卻少有觀察或分析的現象」，[1]終於獲得適切的解讀，顯現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塑造及其推廣，而突顯出近代中國現代化中本土和外來因素的影響。如達索彬（Sabine Dabringhaus）及雷柏德（James Leibold）的近著，皆分別論述中國知識分子對清帝國邊疆地區的認知和研究。其中，達氏的著作《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歷史地理學思潮，1900-1949》（*Territorialer Nationalismus in China*: *Historisch-geographisches Denken 1900-1949*）特別關注民族主義中的地緣性，並探索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家如何在中華民國危亡時期，維繫及推廣「大中國」的概念；此地緣民族主義（territorialer Nationalism）

* Alexander Kais,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E-mail: r96123023@ntu.edu.tw。

1 Michael Tsin（錢曾瑗）, “Review of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3 (Aug., 1998), p. 8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助於具多元文化及族群的清帝國轉型為現代中國。本文將評介達氏的著作，並在第四節將之與雷柏德的專著《重構中國民族主義——清朝邊區及其居民成為中國人之過程》（*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 Indigenes Became Chinese*）作一對照。[2]

達索彬女士，出生於 1962 年，德國佛萊堡（Freiburg）人，1984 年畢業於佛萊堡大學歷史系，1986 年獲中國史碩士學位，1990 年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松筠治藏研究〉，是第一位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科博士的外國留學生。[3]現任佛萊堡大學東亞史教授，其研究領域包括比較史（comparative history）、民族主義、移民史（history of diasporas），目前專研南洋的華僑社會，以及西藏、蒙古等議題。達氏撰有《毛澤東》（*Mao Zedong*）、《中國近代史——從元代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Geschichte Chinas von der Mongolenherrschaft bis zu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等專書，另撰有〈跨越邊界的認同觀：民族主義與華人移民群〉（"Grenzüberschreitende Identitäten: Nationalismus und chinesische Diaspora"）、〈清代邊疆開發研究概述〉（與馬大正、成崇德合著）等論文。

《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於 2006 年出版，研究斷限為 1900 至 1949 年，係以顧頡剛（1893-1980）、錢穆（1895-1990）、戴季陶（1891-1949）、傅斯年（1896-1950）等人的研究，及《禹貢》、《新亞細亞》、《地學雜誌》等刊物的文章為主要史料，並參考何秋濤（1824-1862）、張穆（1805-1849）、魏源（1794-1857）等人的著作。達索彬運用的二手史料及相關理論頗為完備，論述架構及理路亦十分清晰。全書除前言和結語，共分七章：前言和第一章說明其核心理論，第二章至第六章析論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在二十世紀的建構及發展，描述各派學者對中國歷

2 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How the Qing Frontier and its Indigenes Became Chinese*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 見〈授予博士學位的首名外國留學生〉，《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xw30/pdssn/ssnzdy/268816.shtml (accessed July 27th, 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邊疆地區、國土經營等議題的認知和構想，以闡明不同論述所隱含或標榜的民族主義思想。第七章則以回民為例，解說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如何理解己身在多元民族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附錄有八幅地圖及禹貢學會學員的照片，書末有羅馬拼音－漢字的對照表、徵引書目和關鍵詞索引，俾供讀者參考。

二

達索彬在前言中述說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內涵及其形成的時代背景，指出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以民族作為政治及群眾認同之核心，但對民族（主義）的相關批判及反省卻甚少，故中國並未進入「後民族國家」（postnationalistisch）的階段。如同他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國的知識分子亦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他們透過新思想的歸納及介紹，重新定義過去的政治文化。但達氏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於試圖推翻帝國的政治制度時，從未質疑國家在「空間上的連續性」，故中國能保留多元民族帝國的基本面貌（頁 5）。在清帝國轉型至現代中國的過程中，傳統的天下觀雖轉換為民族主義，但由於民族想像的關鍵在於國家，而非為人民，故辛亥革命後排滿的民族主義迅速為「五族共和」的主張所取代，致使國家在地緣上仍保有其連續性。惟民國的成立並未實現統一國家的理想，反而一再遭致來自國內、外的挑戰。本書所追溯者，係歷史地理學派如何透過地緣民族主義的塑造及運用，在民國初肇的「轉折時期」（頁 13）維持「國家統一之理念」（Großstaatgedanke）；達氏因而將該時段視為國家統一理念的「潛伏期」（Latenzperiode，頁 12），並以此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

達索彬認為，二十世紀的歷史地理學家雖無士紳階層的政治權力，對國家事務卻至為關心，顯示其理念上承繼傳統士人（Literati）的社會角色——即以身為國家在道德和學術上的領導者自居（頁 22）。至 1930 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日漸熾盛，中國成為其侵略目標之一，歷史地理學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家的影響力亦隨之增加。因其研究成果，使中國領土的完整在國際法的層面上具有正當性；中國民族主義的關鍵乃從「民族」轉至「國家領土」，形成帕瑞克（Bhikhu Parekh）所謂的「地緣民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頁 15）。地緣民族主義者追求政治疆域在時空上的統一，將該理想投射至歷史脈絡中，以合理化己身的主張，而試圖在三個層面彰顯中國的統一：其一，藉由史料的彙編及詮釋，點明國家概念的悠久；其二，從國防的角度指出邊疆地區對中國本部乃至關重要；其三，基於傳統夷夏之辨的思維，定義少數民族在中國的角色，即強調其本身的落後，以及其將來漢化的必要性。

在第一章〈史學基礎：從經世之學至國族史〉中，達索彬述說徐松、張穆、魏源等經世學家的思想，以說明地緣民族主義的傳統起源：經世學家在外患的緊逼之下，首先從世界的角度理解中國及其地緣範圍，因而注意邊疆地區，提倡將「夷狄」漢化並納入中國，故首次提出由漢人統治的多元民族帝國之想像（頁 30、32）。該思潮乃為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王國維等知識分子所建立的新史學奠下基礎，但不同於魏源等人，新史學家不再將清廷視為政治文化的核心；其治史角度係以「國族」取代「天子」，而提出以國族為主體的直線性歷史論述（頁 41）。

達索彬認為，民族主義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觀念，他們的思想意涵雖差異甚大，但彼此間的論爭和個別的學說，實均將「中國」標榜為終極鵠的。他們透過新史學的方法詮釋傳統史料，編寫出長達數千年的國族史，並將中國視為從未中斷的文明共同體。不過，新史學與傳統通史間最大的差異，係前者預設清晰的國家疆界；傅斯年等新史學學者因而面臨定義「中國」之困境——即在曖昧不明的現狀下，如何判定中國所包含的地緣範圍和族群。

本書的第二章為〈作為新學術領域的歷史地理學〉，達索彬首先回顧沿革地理（政區與地名沿革之研究）的傳統和演變，再專論繼之而興的歷史地理學派。達氏認為，傳統學術上地理與歷史間的關聯密切，因前者能彰顯後者在空間上的實際作用，而兩者皆有助於「國家文本化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記憶」（“verschriftlichtes Gedächtnis des Staates”）和「官方的自我紀錄」（“amtliche Selbstdokumentation”，頁 84）之形成。至十九世紀中期，隨著經世學派和西方影響的擴展，地理學（包括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的重要性逐漸提昇，至二十世紀張相文（1866-1933）成立「中國地學會」時，地理學已成為歷史的次學科（Subdisziplin），及至顧頡剛成立「禹貢學會」後，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乃盛極一時。該學會的研究重點之一，係為邊疆地區及其居民，以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如顧頡剛認為，漢族本身為多元族群混合的歷史產物，因而推論少數民族亦應循此模式融入大漢族的群體。黃奮生進一步主張，應藉由三民主義的原則容納邊疆民族，以達成中國的統一。達氏指出，中國與西方對歷史地理學態度上之差異頗值得注意：於西方，歷史地理僅代表國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在中國卻為關鍵學科，尤其在顧頡剛的努力之下，歷史地理成為地位甚高的學術領域，且得以維持學科之獨立性，並未直接受到國家體制的操控。

至 1930 年代初，當日本侵佔東三省時，中國存亡問題空前迫切，為因應當時的危機，地緣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益形提昇。第三章〈中國領土：歷史上的正當性及危機管理〉係討論以地緣民族主義為宗旨的學者，如何使民眾對中華民國的領土產生一種「空間意識」（Raumbewusstsein），以加強國家危亡時動員人民的成效。歷史地理學家的研究以民族主義為價值取向，試圖藉由學術達成救亡圖存的目標，然相較於中國本部，他們真正的焦點其實在邊疆地區。中國的歷史地理學者基於漢人的視野分析邊疆地區及其族群，如顧頡剛、童書業（1908-1968）、華企雲等人，多半認同中國是以漢族為主的國家，企圖透過史料的詮釋，說明邊疆地區與中國不可分割的關係，並合理化清帝國在東亞和中亞的地域霸權（Territorialmacht）。由於當時中國東北為日本強佔，歷史地理學家轉而關注西北、新疆、西藏等地區，其論述策略和主張儘管各不相同，但均一再試圖彰顯漢人與少數民族間的聯繫。如史念海（1912-2001）以《三國志》為例，指出過去朝廷籠絡少數民族的菁英階層，說明兩者間固有的緊密互動關係；童書業則指出，中國與邊陲地區長久存有聯繫，甚或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認為邊疆地區比南方諸省還要重要，因為後者較晚才為漢人殖民（頁 98-99）。

達索彬認為，歷史地理學家的主要貢獻在於整理及解釋兩千多年的史料——即營造自春秋以來的國族史，並說明中國政治空間上的演變，藉由此歷史脈絡呈現出具有動態的歷史觀。在方法上，延伸自馬克思唯物論的「地緣決定論」（geo-determinism）儘管對該批學者的研究造成影響，但其核心理念仍源自傳統的地理觀，強調國家對空間的支配和安排。歷史地理學家皆肯定大一統的必要，使得邊疆地區成為中國存亡的關鍵，如顧頡剛等人試圖回答中國危機之原因，認為其源自國家政治體制的內在缺陷，並指出中央對地緣範圍的忽視，造成統一國家之瓦解，而非係外在因素所致。總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及中央政府的持續衰頹之下，「禹貢學會」等組織的知識分子只好以學術為對策，在國際社會上及國內宣揚大中國的正統性，以扭轉現實政局（頁 125-129）。

第四章〈中央與邊疆地區〉，討論歷史地理學家對於國防及地緣政策的構思。達索彬指出，歷史地理學家以歷代中央治理邊疆地區的策略為其研究主軸，如曾問吾（?-1979）、周一良（1913-2001）、王日蔚（1905-1989）等學者對西域、契丹與中央的關係之研究，目的在於藉此籌劃民國時期所能採取的邊疆策略。戴季陶、謝彬（1887-1948）等「新亞細亞學會」的學者，更進一步從失地、國防、邊疆三個層面論析西北等地區，提倡藉由教育及行政機關的推廣，將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納入民國的政治空間，以免重蹈歷朝忽視邊疆地區的覆轍。在此敘述之下，少數民族之民族自決權在於脫離外國勢力的欺壓，至於族群身分的界定則仍強調各族群屬於「中國人」的範疇，而此顯然站在中央的視野理解之（頁 149）；是時中國邊界儘管經常遭到外力挑戰，但邊疆地區的居民，卻經由歷史地理學家的研究，在理論上正式被納入中國國族，中華民國的地緣與族群範圍也由是確定。

第五章〈以殖民而復甦〉，述說歷史地理學家所籌劃的邊疆墾殖活動。由於墾殖的區域被視為國內地區，而非海外殖民地，於是知識分子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不得不塑造出一種全國性的開墾願景，以合理化漢人於邊疆地區的殖民活動。當時的國民政府只管轄邊疆地區的部分，但在歷史地理學家的研究中，邊疆的開發係為復興中華的王道，故多數研究者以西北和滿洲地區為核心對象，積極向國人介紹這兩塊遺失的領土，強調其與中國長久的聯繫，且特別將滿洲地區的物產視為中國未來發展的資源（頁 179）。學者的論述成功地塑造了時人對邊疆地區的想像，但邊疆地區的重要性及現實狀況，實則不如知識分子的宣傳。例如移民到內蒙古等地區的漢人並不是樂觀的開拓者，而是渴望安身立命的難民，並且在艱苦的環境之中，經常與當地人發生衝突。此外，達氏指出，歷史地理學家將農業開墾視為主要的經濟活動，而並未進一步規劃工業層面的發展；對當地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知識分子不僅漠不關心，甚至主張以具高支配性的現代化策略（aggressive Modernisierung），俾少數民族之區域成為現代中國發展的關鍵（頁 204）。

第六章〈族群的多元和國族的凝聚〉中，達索彬述說歷史地理學家如何理解國內的「他者」。歷史地理學家肯定清帝國的地緣範圍，但由於中華民國已經無法採取傳統帝國的統治方略，加上自 20 年代起，國際社會日趨肯定民族自決，於是知識分子必須定義邊疆族群在中國的角色。達氏指出，學者透過人類學和民族學的視角，創造所謂的「少數民族」。由於此議題牽涉民族主義的核心內涵，因此不同學者的敘述策略差異甚大，如親近國民黨之知識分子，強調漢族自黃帝以來即為血緣共同體，並以黃帝子孫的神話宣揚泛漢族主義（Pan-Han-Chinesentum）。顧頡剛則對此說提出質疑，他認定漢人為混合族群，且肯定邊疆居民對中國歷史發展之貢獻。此說與親國民黨知識分子之看法不同，尤其戴季陶致力於封殺之，採取禁銷顧氏著作等手段。不過，如陳高傭（1902-1967）、林惠祥（1901-1958）、呂思勉（1884-1957）、齊思和（1907-1980）、張其昀（1901-1985）等多數學者，儘管對國族神話的看法不一致，但皆肯定漢人的優越性，強調少數民族同化（Assimilation）的必要，顯現出傳統華夷之辨的持續影響。其所謂的同化，乃係漢人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主導的「教化、處罰及行政措施」，而少數民族雖身為中國國族的一分子，卻非「自己命運之主宰」（“Subjekte ihres eigenen Schicksals”，頁 235）。然而，實際的情況與學界論說不同：達氏指出，前往邊疆地區的漢人開墾者，除了面臨若干衝突外，實際上亦經常為當地人所同化，並融入地方社會中，但歷史地理學家並未注意這類互動關係，反而預設漢族根本的優越性。

本書第七章為〈自我融入和自我認同的堅持：中國的回民〉，達索彬在此敘述回人如何理解己身在多元民族國家中的角色。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之蔓延，及回族的特殊歷史背景，該族的重要性於 1930 年代大幅提升；回族長久存在於中國版圖之內，故歷史地理學家視之為同化政策可行之例證，同時國共之爭中，回民亦成為雙方試圖拉攏的對象。惟民國時期關於伊斯蘭教及回族的研究，泰半由回族的學者進行，如傅統先（1901-1985）分析回族的起源，強調其於過去各朝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貢獻，甚或鼓動「同族者」致力於大中國民族文化（gesamtchinesische Nationalkultur）的創建（頁 240）。

回人學者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為「族名」意旨的演變。「回族」原本指的是宗教共同體，金吉堂（1908-1978）則認為，回族以宗教、婚姻和定居三個「意志上的選擇」（Willensakte，頁 243），為其民族文化的決定性因素。由於回民代表的是一族群，而非狹義的宗教團體，知識分子遂強調回族在現代中國應當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馬松亭（1895-1992）提倡回族經由教育的普及化轉為「忠心的國族」（loyales Staatsvolk，頁 256），並全力支持救亡的大事業；蘇盛華主張阿訇應推廣國民黨宗旨，以強化中央政府的統治（頁 263）。碧文波儘管承認傳統回族的高度封閉性，卻積極辯駁漢人學者所堅持的偏見，指出回族的忠誠不限於宗教，而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且效忠於國家（頁 265）。白壽彝（1909-2000）則強調伊斯蘭教並無排他性的種族概念，主張將回民視為中國國族之一員。總之，所謂的「回民」被視為早已融入並認同中國的族群，但同時卻能保留其個別的身分認同，這樣的論述由是影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響中國民族認同之框架，使之超越族群身分而轉向多元族群的國族認同。

〈結語〉中，達索彬扼要地敘述歷史地理學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特別指出馮家昇（1904-1970）、侯仁之（1911-）、譚其驤（1911-1992）等人的角色。後兩者與史念海並稱歷史地理學之「三傑」，他們確保歷史地理學於中共政權下得以持續推廣。達氏指出，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極權體制之下，中央握有關於民族及民族主義的詮釋權，加上國家領土業已固定，不再需要歷史地理學家的擁護，故歷史地理學研究得以擺脫民族主義的主導；早期顧頡剛等人所宣揚的地緣民族主義，實已成為中共政治的宗旨之一。

綜上所述，歷史地理學家認為中國發展的關鍵在於漢化的推廣，因而提倡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即能夠調適國家、人民及空間上各種矛盾的地緣民族主義。禹貢學會等組織所創辦的刊物，便顯現知識分子所扮演的先鋒角色，既廣泛地從事研究，又努力宣傳民族主義及一統國家的理念。他們的思想儘管受到愛國主義的左右，同時卻理性地分析實際的政治問題，且基於具體的歷史經驗進行詮釋，故不全然是「想像」或「建構」的認同觀（頁 274）。達索彬認為，歷史地理學家主張的地緣民族主義，乃為民國時期最具現代性的民族主義思想之體現（頁 277）。

三

《地緣民族主義在中國》所討論的時間範圍，是中國現代化之關鍵階段，相關研究甚多。不過，達索彬的著作顯示，此時段仍有許多待討論的議題，尤其作者所分疏的地緣民族主義，雖對現代中國的歷史沿革提供深具啟發性的詮釋取徑，卻常為學界忽略。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易陷入兩種極端——或過度強調國族想像的主觀性質，從而忽略傳統或現實環境的因素；或過度肯定中國民族的真實性及悠久性，而陷入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一種疏忽政治文化的保守典範，即肯定「民族」本身的古典性，而一再地喚起其核心符號，故實質上亦進行民族主義的宣導。[4]達氏雖點明中國民族主義的現代性，也指出歷史地理學家研究所隱含的本位主義，但同時亦肯定其學術價值，且發掘出此思潮背後所隱藏的傳統根源。

地緣民族主義的崛起顯現民國時期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他們一方面肯定清帝國的領土，認定其與現代中國的國土相符，因而試圖將邊疆地區納入中華民國的版圖。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已經缺乏傳統帝國的政治手段：清帝國仍具有全國性的官僚，且不需採取清晰的邊界概念，因而能夠維持帝國的統一。歷史地理學家則深受西方學術、國際法、種族等思想的影響，致力於定義漢族，而調適其與所謂少數民族間的關係，以追求中國領土之完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陰影下，知識分子的學術活動具有迫切的目標。達索彬適當地說明歷史地理學家的種種敘述策略，及其於學術研究上的貢獻，指出其所標榜的民族主義於近代中國之關鍵地位。

此外，地緣民族主義亦能顯示的，係過去帝國內部的凝聚力，主要依賴政治層面的因素，即中央和各地菁英之間的交流，而地方上的庶民並未直接參與該上層文化。至辛亥革命後，在民族主義的展開之下，無論菁英或庶民皆須融入國族的範圍，惟達索彬並未論析此過程所牽涉的政治大眾化，僅於第三章提及知識分子與百姓的關係。同樣的，達氏雖然注意到歷史地理學家的理論，與開墾者所面對的環境截然不同，但其並未明指地緣民族主義實囿於學術及政治菁英的思潮，而非是普遍的認同觀。可以說，本書適切地評介歷史地理學家的思想及環境，並釐清其特殊的發展脈絡，但對地緣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般理論卻未進一步加以討論，僅於書的開頭表示，民族主義的理論非本書所處理的問題（頁 5）。然而，在史料和理論基礎如此豐厚的情況下，作者宜對於民族主義的本質作出進一步的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參見艾立德，〈晚清民族主義中的省籍意識——以新知識分子關於湘、粵的論述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7 月），頁 8、15。

在寫作及論證方面，本書的內容十分精細。儘管書中處理大量的人物與殊異的理論，敘述亦不全然符合以時間順序為主軸，但章節安排合宜，足以讓讀者明瞭其理路，而不致迷失於文本之中。此外，本書在編輯方面十分細膩，達索彬提供相當完整的羅馬拼音－漢字對照表和關鍵詞索引，且附加歷朝的八張地圖，有助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所論析的題材。長達 40 頁的徵引書目分成一手和二手史料，其中涵括大量中、英、德語等資料，不但顯示作者為學之博與勤，也提供學界值得參考的書單。

四

與本書題材相似的，係雷柏德 2007 年出版的《重構中國民族主義》，在此扼要敘述雷氏與達索彬著作之異同。兩本書皆突顯邊疆地區及其居民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雷氏的切入點和達氏相同，亦試圖說明清帝國至現代中國的轉型。不同之處在於，達氏細膩地描述歷史地理學家的研究及思想，並提出地緣民族主義的概念，以顯示不同於西方的民族主義；雷氏則以較為宏觀的視野，分析政治、學術、軍事等層面的問題，以說明邊疆地區的關鍵性，並比較分屬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和學者，在邊疆地區之論述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章節架構上，雷氏的著作除了描述歷史背景的第一章，共分成「政治策略」和「文化創新論述」兩大部分。前者論析國共兩黨各自對於邊疆地區的認知及策略，如述及國民政府對閻錫山（1883-1960）等軍閥的依賴，亦提到少數民族所追求的政治目的。第二部分針對黃帝子孫的政治神話、北京人的考古發現、民族主義對學術之影響等議題，陳述國共兩黨學者間的爭論。無論第一或第二部分，皆顯現出政黨間的差異係為政治利益所決定，而非屬理念問題而已。隨著《中國之命運》的出版，中共儘管在宣傳中反對國民黨「法西斯式的種族主義」（fascis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cism），[5]但其所使用的「中華民族人種」概念，實同樣強調此多元族群於血緣和文化上的共同性，又將少數民族的議題納入內政的範圍，故暴露出與國民黨相同的本位主義。[6]

達索彬和雷柏德的著作雖係針對同一個主題，但研究視野卻不盡相同。兩書在討論學術層面的問題時雖有重疊，但關切的議題仍有所差異，如雷氏論析知識分子對於北京人、種族的相關爭論，達氏則並未將之納入其分析框架，反而詳細解說地緣民族主義的內涵及用意。由此可見，與其將兩書的差異與未處理的議題視為學者某方面的不足，不如假定此適足以顯示晚清至 1949 年間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故許多議題仍待更詳細的研究。例如，兩位作者均強調日本帝國主義對漢人知識分子所發揮的影響，卻對日本知識分子關於中國的若干言論（如否定中國具備國族身分等）及其作用述而不論。[7]

總之，兩書皆為精緻的學術著作，具有互補作用，且均從學術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增進吾人對中國現代化的瞭解，適切地呈現出邊疆地區在國族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承蒙胡平生、劉慧、衣若蘭三位老師及匿名審查者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蘇聖雄　校對：蘇婉婷　劉昱妤）

5 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pp. 148-149.

6 James Leibold, *Reconfigu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p. 88.

7 參見 Kai-wing Chow（周啟榮）, "Narrating Nation, Race, and National Culture: Imagining the Hanzu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in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eds. Kai-wing Chow, Kevin M. Doak, Poshek Fu（傅葆石）(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 66-69; Kevin M. Doak, "Narrating China, Ordering Asia: The Discourse on Nation and Ethnicity in Imperial Japan," in *Constructing Nationhood in Modern East Asia*, pp. 92-96.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